文匯时评 中国新闻名专栏

公共文化建设的几个课题

陈保平

日前，笔者在上海文化广场听经典德语音乐剧《莫扎特》，票价不菲，但发现二、三层座位几乎坐满，600至1200元的票也有八九成观众，且大都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这个剧刚开始出票时并未达到预期，随着口口相传，网上热评，上座率持续上升，周日还加了下午场。说明上海这个地方，只要真有好作品、好演出，总能受到观众青睐。

文化需求正在成为市民提升生活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上海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以及到2040年要建设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的目标动力日益增强，各级政府和主管部门越发重视公共文化建设，投入不断加大，硬件设施加快均等化布局，社会主体也被积极引入参与，成绩有目共睹。但在听取人大代表意见后，有些问题也引起笔者的思考。

需要提升审美价值

现代公共文化因其所具有的公益性、价值性、普惠性、均等性、便利性而区别于一般的市场文化。其中讲价值性的时候，现在比较多的是讲提高人的文明素养的价值目标，这当然没有错，但好像忽视了文化作品、文化活动本身的审美价值。有代表说，现在一提公共文化，就把它等同于过去的“群众文化”“娱乐文化”，或者是相对于“经典文化”的“通俗文化”。这样的理解有片面性，容易在公共文化的内容建设上，出现陈旧、单一、肤浅和概念化的倾向。

文化、文艺服务的特性决定了它是通过审美让人在愉悦中完成对价值的认知。中国农耕社会历史悠久，过去文盲占大多数，许多中华美德、做人的道理主要就是通过地方戏、村头草台班子的演出，通过故事、唱腔和表演的艺术魅力，让老百姓获得和传承的。我们现在所说的提升上海城市文化品位和市民文化素养，当然包括核心价值观、包括“老七不”“新七不”的文明要求，但同时也应包括市民对美的鉴别与欣赏能力，包括一个城市对美的认识、接受和展示能力。一个缺乏审美教育的公共文化建设是“跛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公共文化建设不仅要提供通过审美达到认知价值的内容和项目，本身也承担着对公众“美育教育”的重要职责。

活力在于市民参与

许多代表谈到，公共文化建设的重心应在基层，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但相对来说，现在平日里面向老年人的活动较多，兼顾上班族、青少年活动的内容还较少。有文化的社会组织介入社区文化中心的也不多，这方面需要机制的支撑。什么样的模式比较适合社区文化活动的持续开展，是值得探讨的问题。前不久，笔者到长宁区北新泾文化中心看了一场市民自演的京剧折子戏，很不错。这是一个取名北新泾京剧学习研究社的社团组织，由资深票友张连玉老师创办，至今已有十多年，每周有一次学习交流，通过舞台实践提高演、唱技能。经过几任老师的接力，现在人气越来越旺，北新泾文化中心也因此改成了民俗文化中心。这些“票友”的活动场所，他们称之为“票房”，由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免费提供。参与活动的有年长的爱好者，也有戏校的学生。演出经费完全靠自给自足。现在，长宁区几乎每个街道都有这样一个“票房”。这种由专业工作者指导引领，京剧爱好者集聚参与，政府提供场所、服务，定期举行演出的模式，不仅激发了京剧爱好者的热情，加深了对京剧艺术审美的了解，并在更大的社区范围内传播了传统艺术。

这个案例让我们看到，由兴趣爱好走到一起，并愿意通过不断学习提升自身品质的“共同体”，可能是基层公共文化建设中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值得其他门类的爱好者借鉴。这中间，有专业特长的文化志愿者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

核心观点

我们现在所说的提升上海城市文化品位和市民文化素养，当然包括核心价值观、包括“老七不”“新七不”的文明要求，但同时也应包括市民对美的鉴别与欣赏能力，包括一个城市对美的认识、接受和展示能力。一个缺乏审美教育的公共文化建设是“跛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公共文化建设不仅要提供通过审美达到认知价值的内容和项目，本身也承担着对公众“美育教育”的重要职责

顶层设计要有实施路径

去年上半年，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上海市贯彻〈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应该说，顶层设计思路清晰，方向对头，问题是如何实施，如何通过制度性的安排和责任的明确，让《意见》真正落地。

笔者曾遇见过一位有情怀的民营文化公司老总，他们以策划举办国际美展为主，成立五年来，先后举办了毕加索、莫奈、雷诺阿等近十个展览，为上海这座城市提升艺术品位、拓展国际视野作出了贡献。但这些展览的成本都较高，除了一个展览略有盈余，其他都亏损。他说，如果政府没有相应的政策支持，场租空间不能给予优惠的待遇，他也很难维持下去。类似这样的问题怎样解决？谁来解决？都是公共文化服务需要探讨的。政府不仅要引导社会主体共同参与现代公共文化建设，而且要了解和发现不同社会主体在参与中遇到的问题，及时研究对策。对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就要考虑调整或出台新的政策。如果是单个的问题，也可一事一议，或引入第三方评估，或牵线搭桥帮助找合作方等。总之，要本着有利于文化繁荣的目标，让各类社会主体在参与公共文化的实践中发展、壮大起来，而不要让他们在困顿中萎缩、消亡。

前一阵，区、镇反映较多的一个问题：社区文艺指导员严重匮乏。这不仅因为各类文化团队种类多，且这些团队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产生提升水平的需求。据主管部门介绍，目前市级配送平台上，基层认可、常用的文艺指导员仅200人左右。实际工作中的同志谈到，这里既有教授级专家到社区带“入门级”团队的尴尬，也有艺术类大学生因寒暑假而不能保证带教时间的无奈。怎么办？主管的文广影视局主动作为，广开思路。他们提出：一是拓展队伍，除了继续实行在校艺术类大学生带教的做法外，依托市群艺馆的培训功能和示范效应，从群众文化团队中发现和培训艺术骨干，充分发挥群文骨干在团队中的自我教育、自我提高的作用；二是研究完善专业艺术院校大学生文艺指导员的输出作用，加大文教融合，尝试推进将大学生指导员参与社区文艺辅导课时纳入专业课学分或列为实习要求等制度设计；三是发挥市文联等社会组织的优势，推进专业协会组织会员深入社区承担文艺指导员工作，充实文艺指导员的专业类别。这就使顶层设计有了实现的路径，加快现代公共文化建设才可能实实在在地得到推进和落地。

（作者为上海市人大代表、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驻会委员）

两会时评

提升职业技能素质、强化职业身份认同，委员建议——

在进城务工者中培育“上海工匠”

■本报记者 史博臻

632米高的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巍然屹立，可很少有人知道，建设过程中开着“中国最高塔吊”、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的李杰，是一位从贵州山区来到上海打拼的进城务工人员。

三个月前，88名首批“上海工匠”脱颖而出，其中进城务工人员有10人，李杰榜上有名。李杰的入选当之无愧，因为今年30岁的他所干的工作、掌握的技艺，在上海也许没有第二个人能够替代。

上海，是一个从来都不缺少优秀工匠的城市，而像李杰这样的“新生代”备受关注。“从某种程度上说，高端人才影响的是城市的发展速度，进城务工人员的整体素质则直接影响城市的正常运转，影响市民的正常生活。”在16日下午举行的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大会发言中，市政协委员、上海工会管理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吴萌代表上海市总工会作大会发言时建议，要在进城务工人员中大力培育“上海工匠”，使“工匠精神”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价值追求。

在首批“上海工匠”中，从贵州山区来到上海打拼的进城务工人员李杰榜上有名。图为李杰开着“中国最高塔吊”临上海之巅精吊细筑。（上海建工机施集团供图）

30岁的“中国最高塔吊司机”

李杰是上海建工机施集团的一名塔吊司机。塔吊驾驶室不到2平方米，孤悬在数百米空中，任何细小零件的掉落都会引发灾难事故。从上海中心大厦开工到封顶，李杰没有出现过一次失误，仗着一手精吊细筑的绝活，他和同事们先后将10万多吨的钢结构、2万块外幕墙及数十万件的建筑材料准确无误地运送到上海中心大厦的每一个角落。

为了在云雾弥漫中确保吊运安全，李杰从时间、空间入手练就一手“盲吊”技术。细心的他通过观察和积累，掌握了陆家嘴地区云雾出现的时间规律，并将周边东方明珠、金茂大厦、环球金融中心等高大建筑物的方位熟记于心，只要有5米的能见度，就能基本判断出构件的水平方位。

手握绝招、头顶“中国最高塔吊司机”名头的李杰成为首批“上海工匠”之一。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美华告诉记者，要在建筑行业有所建树，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无论是承担大项目还是钻研小项目，都需要低下头、沉下心，脚踏实地对待每一个产品、每一道工序。

“要在进城务工人员中大力培育‘上海工匠’，努力让他们成为工匠选树的重要人才支撑。”吴萌说，随着新生代进城务工人员的崛起，他们在适应和融入城市的同时，更需强化对职业身份的认同感，在各自生产领域成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建议定期发布进城务工人员就业导向

“在未来上海人口布局中，进城务工人员规模、内部构成、区域分布、文化层次，如何与城市发展要求相适应，需要提前做好谋划，特别是对其导入导出问题要作系统性研究。”吴萌建议有关部门定期发布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导向，分别明确需求不足和供给过剩的区域、行业，努力通过明确的就业政策，从源头上推动这支队伍与产业发展相适应。

眼下，进城务工人员主要分布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建筑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等，还有环卫、快递、物流、餐饮、护理等与市民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

“这个群体已成为上海产业工人的主体，在上海劳动者构成中不可或缺、不可替代，因此要与时俱进提升这个群体的职业技能素质。”吴萌说，上海在建设卓越全球城市过程中，将对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技能、职业精神提出新的要求。“要适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的普及，聚焦进城务工人员集聚的产业行业，促进职业教育体系与职业岗位需求相适应，推进技能培训的转型升级。”

此外，“网约工”队伍的素质有待提升。从目前看，快递代驾、家政保洁等以网络平台为支撑、以进城务工人员为用工主体的“网约工”队伍呈快速上升趋势。“随着时间推移，这一趋势会更加明显。”吴萌告诉记者，与传统的在固定单位就业的进城务工人员相比，“网约工”没有固定的劳动关系，四处流动分散、难以有效组织职业培训，职业素质提升面临新的难题。因此，他代表市总工会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高度关注这一群体，避免他们发展成为职工队伍素质提升的洼地，成为社会治理的盲区。

建立劳动者成长终身教育体系

■本报记者 李静

首批88名“上海工匠”中，进城务工者占11.4%；去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授予598位优秀劳动者，其中进城务工者为83人，占比逐年增加；申城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以进城务工者命名或作为领军人物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技师创新工作室和职工创新（服务）工作室；本市原以班组长为培训主体的初级工商管理（EBA）培训体系的主要受益人群，转变为以进城务工者为主的基层一线职工；进城务工者兼任市区两级工会组织的副主席等领导职务……

市总工会相关责任人昨天表示，近年来，本市服务进城务工者的工作重点从劳动维权逐步向提高其劳动素质、培养其“工匠精神”转变，以逐年增多的实事项目和扶持力度为他们鼓劲加油。

“在选树之外，本市工会系统今年还将更加重视培育工作，将主办或者协助市人社局和相关企业等开展比赛、培训、讲座等活动，以最贴近、最简易的方式提高进城务工人员的综合素质；最终探索产学一体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务工者技能技术的培训，推动形成有利于其成长的终身教育体系。”上海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肖堃涛说。

目前，上海约有667万进城务工人员，其中在单位就业的约532万人，自雇就业或灵活就业的约135万人。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建筑业和租赁、商务服务业等，还有环卫、快递、物流、餐饮、护理等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行业，就业的几乎全是进城务工者，占了上海就业人口的一半以上，成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一线职工的主体，也是城市健康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

近年来，上海市总工会通过技能比武、岗位练兵、学历培训、晋级奖励等多种方式，提高进城务工者的技术技能、综合素质和社会认可度。“进城务工人员有进步的需求，工会系统也有相关的服务项目，每年都会提供很多机会和平台助他们学习进步和实现梦想。”市总工会负责人介绍，市总工会的统计显示，近几年的评先评优、各类劳动竞赛、创新工作室创建、职称晋级奖励、一线职工授权发明专利奖励、“高师带徒”补贴、“工匠”培养、学历提升培训中，均会设一定的硬性比例，将“福利”送达进城务工人员，今后这个比例还将提高。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左学金认为，目前的就业人口结构对于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持续发展还是一个挑战，“农村劳动力向工业部门和城镇大规模迁移流动，一线工人存在雇用短期化、专业技能普遍不强等特点，制约了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高劳动者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培育其‘工匠精神’是当务之急。”他说，“工匠精神”的基础是技师技工，本市目前的技术工人还远远不够，而进城务工人员是一个巨大的人才“蓄水池”，全社会投入更多资源提高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在内的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是必然选择。

市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第二次大会发言摘编

团市委、市青联王宇：发展实体经济不能让青年人走开

十届市委十四次全会提出要防止资源、资金、资产脱实转虚，巩固提升实体经济能级。但近年来受大环境影响，青年企业家对于投身和参与实体经济的意愿并不强。原因主要有四方面：一是实体经济门槛高；二是实体经济赚钱慢；三是民营企业顾虑政府对其参与实体经济的扶持力度不及国企；四是很多青年企业家不清楚哪些是政府鼓励的实体经济类别，怕投错方向。为此建议：第一，市级层面扶持实体经济的相关政策普遍较宏观，应加快从政策到细则的转化；第二，公开重点扶持的实体经济产业目录；第三，要在青年企业家群体中大力弘扬和倡导以“工匠精神”为内涵的新一代海派企业家精神。

市工商联丁佐宏：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民营经济已成为本市创新的重要力量、扩大就业的主体力量，推动和体现上海经济活力的骨干力量。但其发展依然存在一些问题，如氛围环境不够，市场准入无形的阻力还存在，等等。为此建议：第一，进一步完善制度安排，增强民营企业投资的有效感，鼓励政府部门转变思想观念，对民营企业多设路标、少设路障等；第二，进一步优化政策设计、增强民营企业政策的获得感，包括在出台政策措施前广泛听取协会商会、民营企业的意见建议，在项目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操作中确保公平待遇，探索建立政府采购保险机制；第三，进一步提高服务效率，增强民营企业办事的便捷感。

民建上海市委尹京苑：“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治要坚持法治用好技术

全市范围内推进的“五违四必”环境综合整治，是上海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起步动作。整治不但要上下一心、长短兼顾、内外兼理、标本兼治，还得坚持法治精神，依靠科技进步。坚持法治精神，是让违法者知道，其个人逐利行为，侵占了公有产权，侵害了公共利益，损害了社会公平，影响了城市发展和城市形象，应当予以纠正。还要让每一个执法者知道，所有整治行为的初衷，是维护公有产权和公共利益，其个人言行应当体现法治精神而非任何部门或个人的利益和欲望，一切行为应当在法制框架内受到约束和限制。

依靠科技进步，是通过卫星、无人机等科技手段，对“五违”行为实现全方位、全天候的监控。还要用好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对“五违”行为实现动态化、智能化的监督和反应，真正做到防微杜渐。同时，整合好机械、电子、生物装备和产品，形成环境恢复、维护和优化的良好态势。

民革上海市委李栋樑：利用“法律大数据”提高城市治理能力

利用法律数据改善城市治理与公共服务的途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及时发布法律数据，让市民便捷、及时了解法律；二是让立法、执法与司法部门之间分享信息，形成系统的法律数据，更好地配合与制衡，有利于提升政府公共服务品质；三是科学分析法律数据，以数据技术倒逼治理机制改革。

因此，要设定法律数据采集标准，建设统一的“上海市法律数据库”，并制定法律数据分享与共享办法，为全社会无偿使用部分法律数据提供技术平台。另外，在建设、健全法律数据基础上，优化上海法治城区创建评估指标体系，把“法治指数”落到实处，并以技术排名倒逼市区两级治理机制改革，同时发挥市场作用，建立政府购买法律数据政策产品的制度。

农工党上海市委许剑民：提高垃圾处理效能要齐抓共管

上海2015年生活垃圾清运量高达790万吨、建筑垃圾近1亿吨，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处于超负荷状态，垃圾分类减量工作的有效开展迫在眉睫。建议强化垃圾分类统筹整合，细化垃圾分类执行规则，建立主管行业专业指引、相关行业负责落实的齐抓共管格局。

要建立垃圾分类减量宣教制度，多层次、多角度强化市民意识。多手段提升市民垃圾分类意识和水平，加强基层社区重视和执行力度，以社区为单位，加强落实垃圾分类减量的推广，并将其纳入社区考评，督促执行力度。教育部门应当将垃圾分类处理等环保理念贯穿整个基础教育之中，从小培养良好的习惯。加强社区管理的同时，应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既提高社区环保力度，又增进社区和谐。

对于建筑垃圾，要以规范和补偿为两翼，建立分类处理规范，建立合理回收利用机制；建立收运全程管理系统，对建筑垃圾的清运和处理运用各类手段实施全程监控；建立有效的补偿机制，建立一个良好的市场调控为主导的处理机制。

市工商联方加亮：推进分级诊疗提升医疗资源利用有效性

为解决大医院“看病难、配药难”的社会难题，上海近年来积极推广以家庭医生为基础的分级诊疗制度，目前还有一些瓶颈与不足，表现在：分级诊疗的上下衔接不畅，出现社区“一头热”现象；综合医改的基础在社区，但社区药品种类限制太多；家庭医生的签约服务同居民的实际期望存在较大偏差；家庭医生服务的扶持和激励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

完善家庭医生制度的对策，一要完善综合医改激励机制，拓宽家庭医生签约内容，社区医院可以将“医养结合”和“长期医疗护理”融入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帮助社会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二要突破政策瓶颈，提升社区医疗服务能力，建议医保部门推进支付方式改革，将家庭医生开展的健康管理、健康教育等服务项目逐步纳入医保范畴；三要进一步推进分级诊疗，提升医疗资源利用的有效性，明确社区医院和二、三级医院的功能定位，逐步引导病人就诊“规范有序”；四要实现社区诊疗的标准化和连续性，确保患者在社区医院和二、三级医院能够获得同样优质的服务。

本报地址：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编：200041 电子信箱：whb@whb.cn
电话总机：(021)22899999 传真：(021)52920001(白天)
发行专线电话：(021)62470350 广告专线电话：(021)62894223
本报北京办事处 北京市崇文门东大街6号8门7层 电话(010)67181551
本报江苏办事处 南京市龙蟠路盛世华庭B7幢 电话(025)85430821
本报浙江记者站 杭州市庆春路182号7楼 电话(0571)87221696
本报湖北记者站 武汉市长江日报路28号23楼E2室 电话(027)85619496
本报陕西记者站 西安市西影路486号 电话(029)85521589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1.00元 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